

新时期中国特色外交风格的形成、 演进动因及其现实挑战

胡宗山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关键词]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外交;外交风格

[摘要] 一个国家的外交风格包含领导人外交风格、外交团队风格和国家整体外交风格。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服务于国家总体目标和对外战略的需要,中国外交逐渐形成尚和但独立、大度而敢为、诚信又理性、谨慎且勇决、务实而坚定的显著风格,体现出刚柔相济、张弛有度、攻守兼备、外圆内方的鲜明特点。中国外交风格为保障中国外交战略的实施,营造稳定的周边和国际环境发挥了突出功效,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它又面临着新的巨大挑战,需要在国家外交战略调整的前提下,进行适度修正。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8-0080-07

一、导 言

外交风格是一个国家在长期外交实践过程中累积形成的品性格调、工作作风与行为特色,它是外交理念、政策、原则与实际外交过程、行为模式相结合的产物。传统上将外交风格的主体归结为从事外交活动的个体特别是领袖人物和外交家,事实上外交风格也具有团体性和国家性。

外交风格可分为领导人个体外交风格、外交团队风格和国家外交风格。领导人个体的外交风

格专指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最高决策者在制定重大外交政策,开展外事外交活动时所展现的个性、品格特征与行为模式特点。例如毛泽东的外交风格表现为恢宏大气、自主刚毅、勇于决断,周恩来的外交风格表现为务实睿智、细致周到、尚礼和君子之风,陈毅的外交风格表现为坦荡豪爽、热情大方、爱憎分明。^[1]邓小平的外交风格则可概括为高瞻远瞩、务实坚定、沉稳冷静,江泽民在外交舞台上以热情、才华与富有个人感染力闻名,朱镕基则以其敏锐、幽默、坦诚获得良好的国际口碑。新一代领导人中,胡锦涛在国际舞台上以严谨、稳重、博闻强识著称,温家宝则以坦诚、亲民和具有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0 年度一般项目“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0BKS06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0 年度重点项目“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并推动其和谐化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0AZD029)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2-06-08

[作者简介] 胡宗山,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

深厚的历史人文修养为人们所熟知。

就外交团队而言,美国的外交团队整体风格张扬、直白、傲慢甚至盛气凌人,俄罗斯外交团队具有敏感、强硬、粗率的风格,中国的外交团队则具有温和、谨慎、耐心、以静制动、含蓄内敛的风格。

本文所涉及的外交风格是指国家意义上的。它体现于领导人个人外交风格和国家外交团队的风格之中,但又是对这些主体外交风格的抽象与提升。尽管不同时期的领导人和不同领域的外交团队在具体的外事行为特征、模式等方面有所区别,但其背后都浓缩了一个国家整体和抽象的外交风格,这一外交风格既受制于特定时期的国家外交政策与战略,也与一个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文化、执政文化以及时代变迁等密切相关。与领袖个人和外交团队的个性化外交风格相比,国家的外交风格更具普遍性、长久性和共性化。例如,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中,法国作为国家来说,其外交风格中保守甚至安分守己的一面体现得较为明显,而英国的外交风格中则具有对海外的进取、冒险与对欧陆的中庸、平衡相结合的特点。晚清中国在外交上的颓废、自大、昏聩与自闭保守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新时期的中国外交风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较大调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外交风格:尚和但独立、大度而敢为、诚信又理性、谨慎且勇决、务实而坚定。

(一)尚和但独立

1. 以和为贵。中国尚和的外交风格首先表现为热爱和平、维护和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和平外交的内涵和范围都有了更大的拓展。在政策上,形成以“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为核心的“和”外交体系。在行动上,中国积极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维持和平行动,积极参与各类地区危机、冲突和热点问题的解决,维护世界和平、地区稳定。即使在最能体现中国核心利益的领土争端等问题上,中国也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以实际行动暂时冻结争议,履行和平承诺。

2. 协和万邦。新时期的中国外交继续坚守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不称霸,不扩张,不搞集团政治。相反,中国与世界各国积极发展友好关系,在国际社会中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中国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处事光明磊落,对外交往热情坦诚,以理服人,谁都不得罪,和谁都打交道。^[2]中国对上合组织、东亚合作等都持开放态度,不排除任何国家,致力于建设“和谐亚洲”、“和谐世界”,体现了古已有之的“协和万邦”的政治抱负。

3. 温和耐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张本着耐心与诚意,以外交谈判、政治协商等温和手段解决争议,反对动不动就以经济制裁、战争等极端方式解决问题。在巴以和平、伊拉克战争、朝鲜核危机、伊朗核危机等问题上,中国一直强调耐心对话,和平解决,并多次承办朝核危机六方会谈,多次派出特使斡旋中东和平。在叙利亚问题上突出地体现了中国外交温和耐心而又积极有为的风格和特点。中国坚持维护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同时积极寻求合理解决之道,通过在联合国—阿盟等多边框架内的外交斡旋,通过派遣特使赴叙利亚开展政治斡旋,邀请叙利亚各方来中国进行政治沟通等各种方式推动和平解决叙利亚危机。这与某些西方大国缺乏耐心,急躁冒进,动辄就以经济制裁和武力相威胁来处理国际问题的蛮横外交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外交在展现温和耐心的同时,始终强调独立自主,追求独立的人格与国格。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独立进一步表现为实施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即使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也不是为了对抗和针对第三国。

独立自主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中国坚持“和而不同”,既不随波逐流,也不屈服于任何国家的压力,而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立场和态度。中国之所以对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投反对票,就是为了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中国与西方大国可以“和”,但不一定在所有问题上都要“同”。

和而不同还意味着包容和允许多样性的存在。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一直提倡在文化上相互借鉴,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反对把西方的价值观和

原则看成是普世的、要求“环球同此凉热”。

尚和但独立反映了中国外交具有外圆内方的传统文化风格。外圆内方,意味着外表圆柔,行动温和但内心却独立、坚定。这正是传统文化对君子品行的基本要求。

(二)大度而敢为

以和为贵的理念、温和的行事风格是与中国大度耐心的外交特质相辅相成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存在领土争端。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于部分国家在领土问题上主动挑衅而引发的国际争端,中国体现了大度宽广的仁者胸怀,总是先讲道理,希望通过谈判等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只有在道理讲不通、忍无可忍后,才开始雷霆之击,后发制人。

大度与敢为是结合在一起的,越是大大度,越要敢为。2010年9月,针对日本在钓鱼岛挑起的事端,中国退避三舍但事不过三,在原则问题上,恪守底线,最终通过坚决的外交斗争,维护了主权尊严。

中国以宽容大度之心,先忍让、再反击,后发制人的外交风格既体现了中国人为人处世的独特风格,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退避三舍,友好当先,抵抗在后”等外交思想的直接继承。^{[3](P327-328,406)}无论是治理内政,还是对外交往,中国执政者历来讲究德威并举,恩威并施。“后发”是“立德”,“制人”是“立威”。这是儒家思想中的君子之道即宽恕之道的要求。中国的行为展现了大国风度,但耐心等待不是甘心被捉弄,善意大度不是软弱可欺,巨人一旦发怒,犯我者虽远必诛。大度敢为结合到一起,就是攻守兼备,后发制人。中国可以退避三舍,让你三尺,但一定会恪守底线,捍卫自己的尊严。

(三)诚信又理性

言必信,行必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讲话算数,信守承诺,富有诚信是中国外交的一大特点。在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中国曾经声明,只要苏联愿意消除三大障碍,双方就可以改善关系,后来的史实证明了中国言行一致。在香港问题上,中国信守自己的诺言,认真履行中英联合声明,这一点就连英国政治家也是承认的。^{[4](P325-326)}中国是一个大国,讲话算数是维护大国尊严的重要体现。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中,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说到做到。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以实际行动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还承诺对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5%的输华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5]目前已经落实。

诚信意味着讲究大国的责任。中国采取与大国身份相符的外交行为,履行与大国属性相应的外交责任。在双边外交中,中国执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发展经济合作,极大地带动了周边国家的发展,帮助它们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困境。在多边舞台上,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治理,在稳定朝核危机、打击恐怖主义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外援助直接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向161个国家、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2563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减免了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380笔,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人员12万人次,累计派出2.1万名援外医疗队员和近1万名援外教师。^[8]

说话算话,讲究诚信的同时,中国仍然将维护自身利益放在首位,捍卫主权尊严、领土完整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利益,这就是理性。多年来,中国顶住了美国等西方大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对外援助中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履行了过多的国际主义义务,超过了本国财政所能承受的限度。改革开放后,中国继续履行承诺,开展对外援助,但十分注重把握度,杜绝了超出国力的行为。

(四)谨慎且勇决

不说过头话,不做冒险事,谨慎、稳重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风格,是中国对涉外工作的一大要求。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一些访美的代表团在美言论行动不谨慎,受到邓小平的批评。^{[6](P376)}江泽民也曾指出中国外交不能政出多门,各行其是。^{[7](P315)}中国政府一贯强调对外统一口径,十分重视对国内舆论的正面引导,使之与中央保持一致,避免因失慎而使事态激化。即使因为国家利益和战略需要而必须对外斗争,中国也遵循中庸之道,说话办事往往留有余地。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美国之间在贸易最惠国待遇、人权议题、美国售台武器、侵犯我国主权等多项议题中有过激

烈交锋,但中方始终把握“不搞对抗”、“斗而不破”的原则,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最大程度地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尊严和国家利益。苏联解体后,中国“韬光养晦”策略的提出也是这种谨慎、低调外交风格形成的重要体现。

勇者不惧,中国处理对外关系低调慎重,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一旦决策层对重大外交事务形成决断,中国就能发挥社会主义大国的体制优势,雷厉风行,确保外交目标的实现。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后,中国所开展的对美外交斗争就鲜明地体现了“勇决”的特点。在2012年4—5月的中菲黄岩岛争端中,菲方一再无理挑衅,中方在一再容让、克制和退让后,立即迅速集合力量,在外交、军事、经济、舆论等多方面发动反击,坚决打掉了菲方的嚣张气焰。以上行为充分体现了中国张弛有度、攻守兼备的外交特质。

(五)务实而坚定

务实就是实事求是,刚柔相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它在双边和多边对外关系中主要表现为求同存异,化异求同。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提出“一国两制”思路与英、葡交涉香港、澳门回归问题,还是提出“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处理领土争端问题,都是这种求同存异,灵活务实风格的体现。灵活是为了实现更长远的目标、更大的战略和更高的利益。搁置争议就是存主权之异,求开发之同,这是为了通过冻结争端为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环境,使之不至于影响到中国发展的目标,因为与局部的、不激烈的领土冲突相比,抢抓和平机遇加快发展显然是大局。

但在原则问题上,中国一贯坚定,毫不退缩。“两制”的前提是“一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前提是“主权在我”,中国所能容忍的共同开发是要在承认至少默认和不挑战中国主权尊严的前提下,这也可以看作中国的底线。一旦对方有侵犯中国主权尊严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就触犯了中国的底线和原则,必然会受到反击。

坚定的另一个体现就是不畏强暴,主持公道,坚持原则,敢于担当,坚决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斗争,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对于西方在中亚地区制造的“颜色革命”,在中东地区制造的“阿拉

伯之春”,中国一贯反对,体现了对正义的坚持。俄罗斯、朝鲜与中国关系密切,但对前者侵略格鲁吉亚、后者发展核武器的错误行为,中国也坚决批评,从不投鼠忌器。这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形成鲜明对比。在巴以关系上,美国一贯偏袒以色列,中国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态度”,这是中国外交坚定、独立和坚持原则的直接体现。

三、中国外交风格形成的若干因素

新时期中国“尚和但独立、大度而敢为、诚信又理性、谨慎且勇决、务实而坚定”的外交风格可以归纳为“刚柔相济、张弛有度、攻守兼备、外圆内方”这四个蕴含中国传统辩证法精神的成语,它们在哲学上的实质是对“度”的把握,即要求辩证处理“刚与柔”、“张与弛”、“攻与守”、“圆与方”的相对关系。

新时期的中国外交风格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战略与外交行动、实践长期互动的产物,是落实国家总体外交目标的必然结果,在根本上受制于国家外交政策与战略。除此之外,它的形成还受到以下因素的作用。

1. 历史文化的的影响。中华文化是一种和合文化。“和”是理解中华文化的关键词,“和”既是个人修养和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也是处理社会关系和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从性格特点来看,由于历史心理和大陆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热爱和平、追求和谐,为人宽容、性格温和、保守中庸的精神特征,和合文化和儒家文明是中国外交风格形成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和为贵”,反映了珍视和平稳定,不希望折腾动乱这一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普遍心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意味着中国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但绝不采取苟苟蝇营、鸡鸣狗盗的方式。“亲仁善邻,国之宝也”^{[8](P61)}决定了中国处理国际关系时,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协和万邦”更是直接表达了中国处理与世界、他国关系的人文价值观。

2. 执政文化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特定的革命遭遇和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中国外交中革命性成分、斗争性成分体现得较为明显一点,

但求共存、求和平仍是主流。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压倒一切的工作中心,从经济角度思考问题逐渐成为主流执政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邓小平在晚年还曾一再告诫,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不要耽搁,^[2]由此,争取和平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这是中国搞建设的需要。^{[6](P194)[9](P3,233)}现任外交部长杨洁篪也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就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努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10]最高决策者不但希望内部稳定,也希望周边稳定、全球稳定。江泽民曾指出,保持稳定是发展的首要前提,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也搞不成。^{[7](P413)}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遍布全球,世界各地相互依赖程度前所未有地加深,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领域发生动荡,都必然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进入新世纪后,维护国内稳定也逐渐成为执政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如果在外交上过于冒险,一旦出现不利局面,反过来会影响国内稳定。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同样影响到对外决策和行为,那就是要抢抓战略机遇,继续推进经济发展,不断增强国力。在国际维宁、维稳和抢抓机遇发展经济的执政文化影响下,形成了中国外交温和、耐心、谨慎、务实的风格。

3. 新的领导团队工作作风的影响。相对于第一代领导集体,改革开放后的几代领导集体由于成长经历、个人性格、社会环境、国家战略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相对务实、谨慎的风格。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工作作风是柔中有刚,原则性和灵活性兼备,领导风格则是举重若轻,具有革命家的战略远见。后革命领袖时代的领导人,虽然各具个人特点,并在外事工作的个别环节中体现出一定的个性,但由于中国决策体制和权力分配机制中的集体领导成分越来越浓厚,因而其背后所反映的国家外交整体风格仍然是一致的。尤其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风格上都具有温和、稳重、务实、谨慎的特点,这必然也反映在对外工作方面。

4. 时代发展的产物。1989年以后,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趋向多极化,中国国内权力体制也趋向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同时,和平、发

展、合作成为世界主流趋势,中国外交不可能脱离国际大环境,这就决定了中国更多地以和平、合作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温和、务实、谨慎外交风格形成的重要时代因素。

四、中国外交风格的功效与挑战

新时期中国外交所形成的尚和但独立、大度而敢为、诚信又理性、谨慎且勇决、务实而坚定的风格以及刚柔相济、张弛有度、攻守兼备、外圆内方的特点,既是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实践的浓缩和产物,反过来又有利于中国树立良好国际形象,保障外交政策的实施,强化外交战略的效果。在这一外交风格中,“刚与柔”、“张与弛”、“攻与守”、“圆与方”的辩证关系构成内核,其中,对“刚”、“张”、“攻”、“方”等方针的运用体现了中国外交坚持原则、捍卫利益的一面,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尊严,维护祖国统一,确保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不受侵犯。而其“柔”、“弛”、“守”、“圆”方针的运用则体现了中国外交灵活务实、圆润变通的一面,它有利于暂时冻结外交上的分歧与争端,不至于因为局部的冲突与分歧影响到整体利益,有利于克服短视行为,实现长远利益和战略目标,为抓住机遇、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较为和平的环境,保障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目标的实现。温和的外交风格也有利于中国树立良好的国际信誉,那就是爱好和平,坚持原则,敢于担当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在看到中国外交风格所带来的良好功效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原有外交风格的形成与改革开放后特殊的国际环境相关,其功效的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期。但是,在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反恐战争告一段落,遏制防范中国重新成为其对外政策重点之一,在新的国际形势面前,中国外交风格日益面临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挑战。

就宏观而言,一方面,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国国家利益分布全球化的客观趋势日益显著,中国所需要应对的外交事件、争端和突发状况越来越

多,越来越急迫。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投资、国际能源资源供给、海外资产安全、海外公民安全、海外维和、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等各个领域的外交事件日益增加,它需要中国外交在国内外调动资源来实现、完成,它要求中国适度调整外交政策和风格以应对日益变化、扩展的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主观上推行和平发展路线,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但按照西方大国的冷战思维逻辑,中国的和平壮大将会冲击现有国际政治秩序,挑战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西方大国据此思维加大了对中国崛起的遏制,由此引发的国际战略环境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在美国重返亚太后,东亚地区国际局势加快出现连锁反应,中国崛起的战略空间正在受到挤压,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尤其是领土争端将趋于激化,不利于中国的外部因素不断上升,某些重大挑战将会提前到来,中国甚至有可能遭遇若干影响未来发展的危机性时刻。

微观层面的挑战则表现在:其一,由于不同国家战略需求、利益诉求和文化历史的不同,中国现行的政策和风格在实际外交工作中已经受到很大挑战,面临一定的实施困境。例如,在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中,我们主张求同存异,倡导“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部分国家不但不和我“存异”,甚至都不和我“求同”。我们要搁置争议,他们主动挑衅,强化争议、激化矛盾。我们希望共同开发,他们已经单独开发、抢先开发。我们说“主权在我”,他们说主权在他。我们说和平处理、外交处理,他则要武力处理、逐步侵占,造成既成事实,逼你承认。在多数情况下,中国面临的形势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就导致在中国推行和平外交的良好主观愿望与严峻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与矛盾。中国的温和往往被某些国家当成软弱可欺,宽容往往被当成纵容,大度往往被当成胆小怕事,诚信则被当成冤大头,谨慎节制被当成昏愤无能。

其二,现行外交风格中的某些因素或环节容易造成被动式、反应式外交,使外交工作缺乏主动性、前瞻性、规划性。温和耐心、后发制人容易导致缺乏一定的外交预警意识和预警机制,使得中国外交经常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当前,中国国家利益越来越全球化,无论是偶然的突发性事件

还是长期的结构性矛盾都在爆炸式增长,如果过于强调谨慎、温和、耐心和后发制人,过于强调“柔”、“弛”、“守”、“圆”和阴柔的一面,就难以快捷和坚决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

其三,现行外交风格要得到国内社会和公众舆论的普遍理解和认可需要时间,甚至容易招致误解。中国外交风格的几对关键词都涉及辩证法中“度”的问题,在实际操作中,它要求决策者和执行者都能准确、精确地把握其力度与范围,否则要么“不足”,要么容易“过度”,这没有极高的政治天赋和如脑使臂、如臂使手的组织性难以做到。但随着中国国内决策体制和官僚过程的日益复杂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不可能处处恰到好处,事事不偏不倚,在某些个案问题上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偏差,难以尽如人意。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崛起,国内结构、部门利益、公共舆论、国民心态等日益分化,特别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官方与民间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由于立场不同,地位有别,信息不对称等各种原因,使得传统风格中那些“柔”、“守”、缓和、温和、大度、耐心的一面得到国内社会的一致认可需要经过相当艰苦的工作,甚至容易导致误解。例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温和谨慎的外交风格被部分国民误认为是外交上过“软”而招致怨言,尽管可能是误解,但长此以往,必然会削弱执政党的合法性。

总之,由于种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国推行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这一“和”外交政策的良好愿望正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对中国全球遏制、周边围困、重点围攻的严苛挑战,中国的和平崛起与现行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将是未来中国需要应对的主要挑战。要更好地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新变化,就需要对中国现行外交政策和风格作出适当调整,以备中国未来进一步发展之需。

近年来,关于中国外交转型或改革的话题成为学界争论焦点,其中心议题则集中在中国是否仍有必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策略和不结盟政策。笔者认为,短期内中国不可能放弃这两大政策,但外交政策和风格在根本上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也与客观形势的紧迫性相关,不可能一成不变。

世易时移,中国外交必须与时俱进。例如,可以根据形势需要,尝试在结盟与不结盟之间走一条更为灵活的大国合作道路,而外交策略的重点可以由“韬光养晦”向“有所作为”适度转移。与此相适应,也有必要未雨绸缪,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科学地处理中国外交风格的几对辩证关系,尤其是在国际挑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向坚定、有为、勇决、理性,向“刚”、“张”、“攻”、“方”倾斜,更多地展现阳刚、勇决的一面,加强对外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针对性,以更好地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保障中国的和平发展。

参考文献:

- [1] 钱其琛.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陈毅同志 90 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J]. 外交学院学报, 1991, (4).
- [2] 钱其琛. 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 进一步做

好新时期外交工作——在外交部《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J]. 外交学院学报, 1996, (1).

- [3] 周恩来外交文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 [4] 鲁毅等. 外交学概论[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和平发展[Z]. 2011-09,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121982103
- [6] 邓小平文选[M]. 2 版.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7] 江泽民文选[M].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8] 左传·隐公六年[M]. 转引自江泽民文选[M].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9] 邓小平文选[M]. 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0] 杨洁篪.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J]. 求是, 2008, (18).

The Formation, Evolution Motives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the Diplomatic Style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HU Zong-shan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new era; the Chinese diplomacy; diplomatic style

[Abstract] The diplomatic style of a country includes the diplomatic style of its leaders, its diplomatic team, and that of the state as a whole. Since the start of the new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hinese diplomatic style has gradually formed to serve for the overall objectives of the state and to meet the needs of our foreign strategies. This style can be described as being peace-loving but independent, generous and courageous, integrity and rational, cautious and decisive, pragmatic and firm, bearing the characters of maintaining hardness and softness, alternating tension with relaxation, being both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and showing smoothness outside and being unyielding inside. The Chinese diplomatic style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inese foreign strategies and establishment of a stable international climate in bordering areas. However, under circumstances of the new era, this diplomatic style has met new and tremendous challenges. Thus, certain modification in line with the adjustment of the national foreign strategies is required.

[责任编辑 刘蔚然]